

明师以诚 毕生化育

——李放教授的学术贡献与育人之道

邬大光

【摘要】李放教授是当代著名教育家，从教 60 余年，当过小学、中学和大学教师，有比较丰富的教育活动和教育思想。他的研究领域十分广泛，涉及教育基本理论、教育管理、师范教育、高等教育、中国教育史等，其教育观点鲜明，研究视野开阔，方法独特，在许多领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是沈阳师范大学（前身为沈阳师范学院）教育学科的创始人，是辽宁高等教育研究的奠基人之一。

【关键词】李放；教育思想；教育人生；中小学教育；高等教育

DOI:10.13527/b.cnki.educ.sci.china.2014.02.002

2013 年 3 月 23 日，李放老师迎来了 90 寿辰。弟子们从全国四面八方赶来参加先生的生日聚会，一曲《生日快乐》把先生的寿筵推向了高潮。一位学生把一幅“明师以诚”的书法作品送给了李老师。当我受邀撰写李老师的教育思想这篇文章时，突然想起了这幅字，“明师以诚”不就是李放老师的学术贡献和育人之道的完美总结吗？李放老师从事教育活动 60 余年，当过小学、中学和大学教师，可以说是“毕生化育”。在他毕生的教育实践和研究中，他信奉“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在他看来，“知不足”既使人茫然困惑，又催人上下探索。“不用扬鞭自奋蹄”是他的人生理念。李老师的教育研究之路，是以“凿石取玉，剖蚌求珠”的精神，实现了一位教育家“传道、授业、解惑”的责任，也诠释了“毕生化育”的真谛。

一、李放老师的教育贡献

李放老师的教育经历十分丰富，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几乎涵盖了我国教育体系

的所有层次。他的“全方位”教育体验,为他后来从事教育研究奠定了扎实的根基,他的教育感悟既来自他的教育实践,又高于实践。他一生的教育研究,从最初的小学工作总结,到“教育是社会上层建筑”的理论文章,实现了一个教育家应有的蜕变。在小学,他当过班主任;在中学,他做过教导主任、宿务主任和副校长;在大学,他从教员做起,先后做过教研室主任、教务处副处长、系主任、研究所所长和教授。毕生化育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这是一位老一辈教育家的教育轨迹,也是今天新一代教育研究者最缺乏的教育经历。

与年龄相近的我国教育学界的其他老先生相比,李放老师可能是一个极为特殊的“案例”。他毕业于通化师范学校,这是一所专门培养小学教师的中专学校。按照今天的观点来看,李老师属于自学成才,可他最终走向教育体系的最高层次,成为一位大学教授。中师毕业后,他任小学教师三年,从班主任做起,小学的课程几乎都教过。面对“复合班”和“男女合班”的学生,他进行了“打擂式”教学实验,并根据一年的实验,完成了人生的第一篇教育研究论文《关于“打擂式”教学实验的总结》,刊发在《泰东日报》(副刊)上。后来他到中学工作,初中和高中的语文都教过。在他30岁的时候,就开始做中学副校长。1955年底,他以中学副校长的身份被选送到北京的中央教育行政学院学习一年,毕业后分配到辽宁教育行政学院任教,1957年调入沈阳师范学院,开始了高等教育生涯。

李放老师的教育之路起始于中小学,这是一条实践之路。正是中小学的教育实践使他坚信:在教育实践中寻找理论的支点,是一个教育研究者的根基,这也成为他后来从事教育研究的座右铭。李放老师的教育实践与贡献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 创建沈阳师大教育系、教科所,是该校教育学科奠基人。“文革”之后,教育科学研究百废待兴,在李放老师等人的倡议下,1978年,沈阳师范大学恢复教育研究室;1980年,教育研究室改建为教育科学研究所,李放老师为首任所长兼党总支书记。从成立教科所开始,不到五年时间,沈阳师大的教育学科就已成为学校的优势学科。1982年9月,教科所开始招收教学论方向硕士研究生;同年,受辽宁省高教局委托,教科所负责在辽宁省各高校招收84名学员成立德育班。1983年,教育学科获得了硕士学位授予权,这是沈阳师大第一个硕士授权点。1985年,沈阳师大成立教育系,实行系所合一建制,当年开始招收学校教育专业第一届本科生。短短几年内,在李老师的带领下,沈阳师大的教育学科基本建成,1984年5月,沈阳师大的教学论被评为省属重点学科。

李放老师从建所之初,就让沈阳师大这个名不见经传的研究所走上了正确的轨道: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引进人才,出版刊物,组织学术报告会和科研工作会,搭建各种学科平台等工作。朴实的学风,教学与科研并重,吸引了一批有志于从事教育科研的年轻学者,培养了一大批硕士和博士,活跃在全国各高校。也正是从这个时

候开始,我知道了一个研究所应该具有的职能和架构。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李放老师就是沈阳师大的“教育之仙”。

2. 辽宁省高等教育研究的“传道人”。在辽宁省高等教育界,提起李放老师,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在辽宁高教研究起步阶段所发挥的作用,无人可替代。李放老师被称为“辽宁高教研究教务长”,这是当时的辽宁省高教局李冀局长给李放老师的“头衔”。1979年底,辽宁省开始筹建高等教育学会,李冀局长要求“辽宁高教学会要像当年办抗大一样,把全省300多名来自不同专业的首批高等教育专职研究者在实践中培养成既能肩负当前重任,又能发挥承上启下作用的辽宁首批高教研究骨干”,并“钦点”李老师为“辽宁高教研究抗大”的教务长。李老师不负重托,奔走于全省各个高校之间,开讲座、组织学术研讨会,“以省高教学会为纽带,以《辽宁高教研究》期刊为阵地,以各高校高教研究所(室)为教学点”,引导大家如何确立正确的教育科研思想,如何遵循“从实践中来,再回到实践中去”的科研路线。功夫不负苦心人,在李老师与各位同仁的共同努力下,这300多人成为“一支承上启下的辽宁第一代高教研究骨干队伍”。20世纪80年代,全国高教研究刚刚兴起,辽宁省高教学会的工作享誉全国,李老师的贡献功不可没。

3. 沈阳师大和辽宁教育研究刊物创办人。李老师对学术刊物十分重视,把学术刊物看成是一个学术机构不可或缺的研究平台和标志。因此,在主持教科所工作之初,李老师于1980年创办了沈阳师大的《教育丛刊》(内部刊物)并任主编,这是国内最早创办的教育类学术期刊之一。由于经费的制约,该期刊印刷十分朴素。但在当时,能够拥有一份学术期刊,是多么不容易啊。当时的《教育丛刊》拥有一支堪称“豪华”的作者队伍,潘懋元、张焕庭、孙喜亭、黄济、王逢贤、王策三、陈信泰、陈景磐、陈桂生等国内知名学者,都踊跃投稿。《教育丛刊》一直办到1989年第三期,后来由于经费困难,实在难以为继,只好停刊。我还清楚地记得,我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发表在《教育丛刊》上,该文是我的一篇外国教育史作业,任课老师看了我的作业之后,认为可以投给《教育丛刊》。李老师看了我的文章,帮我进行了文字修改,又提出了修改建议,该文最终得以发表。

1982年,李老师又协助辽宁省高教局创办了《辽宁高教研究》,作为第一副主编,主持该刊到1993年底,共11年。当时的《辽宁高教研究》虽然是省高教学会的会刊,编辑部其实是放在沈阳师大教科所,编辑部的主要人员都是教科所的研究人员。直到1994年,编辑部才归到辽宁省高教所,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李放老师任《辽宁高教研究》顾问,退居二线。1998年第4期是《辽宁高教研究》创刊第100期,李放老师作为创办人之一,撰写了《从辉煌走向更大辉煌》的纪念文章。之后,李老师完全退出了刊物工作。100期刊物,近千万字的成果,凝聚着他和同仁们的心血。在他看来,参加此项工作,是一位教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李放老师不仅对《教育丛刊》和《辽宁高教研究》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辽宁高教研究界的每一本著作和每一篇文章,几乎都有李老师的贡献,他是用自己的全部心血,在培育整个辽宁的教育学科。

4. 参加全国“反修·批凯”写作组。1955年秋天,李放老师作为中学优秀校长,以“调干”脱产学习的形式,被省教育厅选送到北京的中央教育行政学院,师从苏联专家,学习凯洛夫教育学一年,成为我国教育科学领域第一批苏联专家的“弟子”。正是在此阶段,他开始系统地接受教育科学的训练,走上了科学的教育研究之路。学成归来后,李放老师被分配到辽宁教育行政干校当教师,1957年调到沈阳师范学院担任讲师和教育教研室主任。

1964年底,中苏关系开始出现裂痕,在教育界也出现了“批凯洛夫”运动。为了做好理论上的准备工作,中央委托教育部在国家层面成立“反修·批凯”小组,即理论写作班子,在全国范围选调专家,每个省选调一位学者参加“反修·批凯”小组,共成立八个组,教育是其中一个组。李放老师被选中参加教育组,在北京工作近一年。“反修·批凯”小组的成员几乎都是当时国内研究教育的著名学者,如华东师大的刘佛年先生、南京师大的张焕庭先生、厦门大学的潘懋元教授等。李老师在整個“反修·批凯”小组中属于“年轻人”,也正是通过参加这个小组,他结识了一大批国内顶尖的教育学者,国内同行也通过与李老师的接触,了解了他的学术水平和为人。自此,李老师进入了国内教育研究顶尖学者的“圈子”,为他后来的教育研究提供了众多的方便和机遇。回顾当年参加“反修·批凯”小组的经历,李放老师认为,这是一个历史的笑话,他作为我国第一批苏联专家培养的学生,到头来又要参加批判“老祖宗”的运动。实际上,李放老师的教育理论功底,既得益于师从苏联专家学习凯洛夫教育学,又得益于“批凯洛夫”运动。也正是这段经历,促使他在后来的研究中,一直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反思中国教育的特殊性,倡导走自己的教育研究之路。

5. 《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教育”总词条起草人。改革开放之后,国家决定编写《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主要参与人大多是当年“反修·批凯”小组的成员。编委会主任是董纯才,副主任是刘佛年、张焕庭等。张焕庭先生领衔撰写“教育”这一总条目,接受任务之后,他想到的第一个人就是李放老师。李放老师欣然接受了任务,从起草提纲到最后统稿,全程参与了此项工作,前后历时一年多。该词条共分三个部分,全文近两万字,李老师执笔第一部分教育原理,首都师范大学的张燕镜先生执笔第二部分,南京师范大学的居思伟先生撰写第三部分,最后由李老师统稿。《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于1985年出版后,李老师的学术声望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当我再次翻开《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研读“教育”这一总条目时,依然可以看到这样一句话:“参加撰稿者还有李放、张燕镜、居思伟。”实际

上,当时参与此项工作的人,都十分清楚李老师在其中的贡献。

6. 组织编写《教育词典》。《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编写完成后,张焕庭先生和李放老师感到有必要编辑一本便于携带和使用的教育词典,于是张焕庭先生担任主编,李放老师担任副主编,开始了《教育辞典》的编写工作,前后共用了一年多时间,采取中外古今兼收并蓄的原则,借鉴外国、立足中国,比较全面地介绍了中国教育的历史遗产、社会主义时期教育的成就、外国教育的历史和现状、新兴教育学科的创立和发展、基础教育的教材教法研究等,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事业服务。1989年5月,《教育辞典》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涵盖了教育学、教育心理学、教育哲学、教育经济学、教育伦理学、教育社会学、教育统计学、中国教育史、外国教育史、比较教育、幼儿教育、教育文献和各科教材教法等基础辞目,比较全面地介绍了教育科学的历史和现状、理论和应用。该词典是国内较早的一本通俗性的《教育辞典》。

李放老师学术的“黄金时代”主要是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前后大约15年。他的学术“黄金时期”,正是他在沈阳师大工作的时期。当时作为他的学生,我们无法感知他当时为何忘我地工作,也无法感知他为何如此敬业和精力充沛。也许如他自己所言,“文革”期间,基本上是“述而不作”,“把困惑隐藏在心底,任凭智灵的煎熬”是他前半生的真实写照。为了弥补失去的时光,他更加勤奋。作为学生,我们从来没有听到过他对历史的抱怨,但我们隐约地感受到他唯一的遗憾,就是在他从事学术研究最辉煌的时期,没能成为博士生导师。1986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在进行第三批博士生导师增补工作时,李放老师是完全有资格申报的,但沈阳师大的管理层不知出于何种考虑,没有进行申报。这既成了李放老师的终生遗憾,也成了沈阳师大发展至今的遗憾!

二、李放老师教育思想的精髓

李放老师的主要著作(编著)有:《教育的困惑与诠释》《中日高等教育比较》《教育学基础》《教育学》《普通高等学校管理》《教育辞典》《李放教育文集》,以及近百篇论文。从数量上来说,他算不上高产的理论研究者。但在我看来,他在特定时期对一个省的教育学科乃至对全国的影响,是当代许多教育家无法比拟的。一位真正的教育家和教育理论工作者,一定是对教育学科的生成、存在与发展具有坚定的信念,并愿意在这个研究领域里做一位勤奋的耕耘者、传道人和领路人。李放老师就是如此之人。

李放老师的教育研究视野开阔,涉猎范围广,就像他的教育实践经历一样,几乎涉及所有的教育层次和教育问题。从教育层次来说,他的研究涉及普通教育、职业教

育、师范教育、高等教育；从研究的具体领域来说，涉及教育基本理论、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学校管理、教学论、德育论、教育方针、教育史等。但真正能体现李放老师大家风范和学术功底的领域是教育基本理论。在教育基本理论方面，他撰写了一批在当时引起较大反响的文章，例如：《教育是社会上层建筑》《教育本质辨析》《关于教育本质问题的争论》《略论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全面学说和我国社会主义教育目的》《高等教育的未来与展望》《中国传统文化与现阶段教育》《现代教育整体功能分析》等。在当时的国内教育研究领域，这些基本理论文章拥有广泛读者。

1. 关于“教育是社会上层建筑”的思想。这是一篇引起全国教育界关于教育本质的大讨论的奠基文章。“文革”结束后，李放老师在《教育研究》创刊号（1977年第1期）发表了《教育是社会上层建筑》一文，刊发之后，很快就引起了全国范围内关于教育本质问题的大讨论。该讨论前后持续近十年，最初是老一辈教育家之间的争论，到80年代中期，一批青年人加入了此行列。我的硕士阶段，几乎就是伴随着这场争论完成的。

李放老师是坚定的“教育上层建筑说”倡导者。他认为教育本质上是通过培养人为政治经济服务的一种社会上层建筑。根据辩证唯物主义，本质即是事物的性质及这一事物同其他事物的内部联系，我们要正确地理解教育的本质，首先要从教育的产生和发展加以考察。人类社会为了生存和发展，必须把人们在社会生活和生产斗争中所积累的知识、技能、思想、意识等，达之远方，传之后代。而人类所积累的关于自然和社会的知识、经验的传递，是通过教育来解决的。教育是伴随着人类的生产斗争和社会生活的需要产生的，是一种专事培养思想品德、传递知识技能的工作。在整个社会结构中，教育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范畴，具有上层建筑的共同特点。这些特点在教育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在阶级社会里表现得更为明显。

教育是各种社会共同具有的一种普遍的永恒的现象，但它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一种社会经济结构被另一种社会经济结构所代替，教育的目的、内容、方法和形式都发生着根本的变化。不同历史阶段的教育现象表明，社会在它所有的历史阶段始终培养新生一代适应社会生产关系。教育总是为政治经济所决定，它反映政治经济，也为政治经济服务。所以我们说，教育是社会的一种上层建筑。教育反映并作用于政治经济，这是一切上层建筑共有的特点，但是，教育还有着自己独有的特点，就是通过培养人为政治经济服务。正是在这点上，教育既体现了上层建筑为政治经济服务的共同性，也显示了它与其他上层建筑服务于政治经济的形式相区别的特殊性。因此，可以说教育本质上就是通过培养人为政治经济服务的一种社会的上层建筑。作为以培养人为其使命的教育的目的，是为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所决定的，是统治阶级利益在教育上的集中表现。教育目的在整个教育体系中是基本的、决定的方面，居于核心地位，对内容、方法和形式起制约作用。无目的的教育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教育不培养人，

就无从为政治经济服务，也就不成其为教育。

2. 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李放老师认为，马克思主义所预见并论证的人的全面发展，是一个崭新的概念，同历史上的思想家、教育家提出的关于人的个性发展的学说和主张有着本质的区别。在他看来，“人的全面发展的本质特征，并不局限于像有些人所认为的那样仅仅是智力与体力的结合。严格说来，智力和体力的结合是人的机体的统一，智力和体力的总和是构成劳动力或劳动能力的基本因素。它们是存在于劳动者身上的‘自然力’。所以，即使一个人脑体结合，也还不是全面发展的人。”针对有学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都没有把道德列入人的全面发展的内涵，李老师认为“并非如此”。“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不论在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领域或是在哲学、教育领域谈及人的全面发展时，对思想品德都有所强调。”因此，把思想品德排除在人的全面发展内涵之外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原意的。李老师坚持认为，马克思的人的全面发展理论至今还是“不容置疑的真理”。

3. 关于党的教育方针的研究。早在1957年党的教育方针发表之后，辽宁人民出版社就邀请李老师写一篇文章，他用几个月的时间，完成了十余万字的《论党的教育方针》一文，却因故未能发表。改革开放之后，在完成《教育是社会上层建筑》一文之后，为了弥补20年前未发表《论党的教育方针》一文的遗憾，他又根据改革开放的新背景，撰写了《全面理解和贯彻我国的教育方针》，并明确提出：坚持当前我国的教育方针，是根据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的指导思想，将其作为教育的政治方向和教育目的的根本指导方针。在阶级社会里，每个国家的统治阶级都各有其教育方针。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的教育来说，除了有阶级性的因素外，还有非阶级的因素，这些因素又有其继承性。此外，各个民族的教育，又各有一定的民族特性。教育通过为政治服务作用于经济建设。科学技术总是以知识形态存在的。因此，在教育中传授科学技术，决定了它不可能像工具那样，直接拿来使用于生产过程。所以，作为传授自然科学知识的教育，也是属于意识形态范畴的一种活动，这一活动的“舞台背景”，就是生产关系和在经济与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利益；脱离生产关系和阶级需要的教育是没有的。不论是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只要符合培养阶级接班人的需要就被取用，否则便加以拒绝。

4. 关于现代教育观的思考。李放老师的教育观，毫无疑问，是具有现代特征的。作为一名拥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教育家，他始终能够运用唯物史观和辩证法分析教育理论与实践问题。在他看来，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前，由于历史认识的局限，一些教育思想和理论对教育的形式和结构等，都没有得出全面的、符合实际的概括。即使在今天，马克思主义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的方法论也起着越来越大的指导作用。正如上文提到的有关教育本质的大讨论，他赞同“教育是一种培养人的综合性社会现象”的观点，然而这一复杂的社会现象则取决于社会物质生产力发展的

水平。再直接一点,决定教育本质特征的是在一定生产力发展水平之上建立起来的一定的生产关系。基于此,他坚决地批判了“教育即生长”、“教育自我实现的过程”等观点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他将教育的本质特征归结为:“根据一定社会的要求来培养人,而教育的社会职能作用,又是通过培养人来实现的。”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李放老师对教育本质特征的概括凸显了他的教育观——培养适应先进生产力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各种专门人才的现代大众教育理念。

李放老师的教育观,其实质是对教育本质问题的哲学思考,其核心是对人才培养问题的现代诠释。正如他所说:“教育根据不同时代的需要形成自己的特性,同时又经常有所改进,不能认为任何时代都可以实施同样形式的教育……不同的教育形式是在特点各异的多种教育场所进行的,今天的教育场所有家庭、学校、社会教育机构和工作单位等。”因此,他在注重正规(学校)教育的同时,也格外强调自我教育、家庭教育、职业教育等,因为这些教育形式具有内在的统一性。李放老师的教育观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教育原理基础之上的,既是对历史已有教育思想的扬弃,又是对现代西方教育思想的批判,富有鲜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时代特色。

5. 有关毛泽东教育思想的认识。1978年以来,我国社会各个领域,特别是教育界迎来了新的春天,而刚刚结束不久的“文化大革命”给人民带来灾难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一次思想上的洗礼。其中,如何正确看待毛泽东思想一时成为全国上下热议的中心,这是一个极为敏感的政治问题,也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历史命题。在邓小平同志的引领下,真理标准大讨论为正确认识毛泽东思想拉开了序幕。李放老师正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下发表了有关毛泽东教育思想的想法,这不仅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更需要过硬的理论素养。他和刘云翔合作撰写的《对毛泽东教育思想的几点认识》中集中反映了他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他们认为:“毛泽东教育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毛泽东教育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原理与中国教育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被教育实践证明了的正确反映我国教育规律的理论原则。”然而,富有深刻理论见解的是,李放老师将毛泽东教育思想看作是一个具有特定涵义的科学概念,他提出:“不能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教育思想看作是毛泽东教育思想……不能把毛泽东哲学思想和毛泽东社会思想都看作是毛泽东教育思想(毛泽东教育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一部分是正确的)……学习和坚持毛泽东教育思想的关键还在于把毛泽东教育思想与毛泽东同志晚年在教育方面的一些错误论述严格地区别开来。”现在看来,他们对毛泽东教育思想的认识剖析和观点辩驳是中肯的、正确的,他们的深刻分析抓住了毛泽东教育思想活的灵魂,抓住了毛泽东教育思想的精髓和实质。此外,他们在对毛泽东教育思想历史形成的梳理中,还创造性地提出了毛泽东教育思想的科学体系(教育哲学思想、教育论思想、教育伦理思想和教育管理思想)以及与马克思主义教育原理的普遍联系。

之后,李放老师又对毛泽东教育思想的发展做了专门的论述,《略论毛泽东教育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便是其中的重要文献,他集中阐述了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首的第二代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对毛泽东教育思想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他从关于教育地位的思想、教育基本理论问题、教育方针、教育方向的思想、思想政治教育、教育改革的思想 and 知识分子问题等七个方面,全面地阐发了对邓小平同志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教育思想的深刻理解与认识。

6. 有关教育立法问题的认识。一直以来,李放老师都非常关注我国教育立法工作的开展与进程,正是一位教育理论工作者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促使他对教育立法问题有着深入的研究和思考。他和同在沈阳师大的张维平老师合作撰写的《关于教育立法的若干问题》《论教育法的基本原则》等论文让我印象极为深刻。第一篇文章是知识性的、概览式的,它能让人对国内外的教育立法问题有一个全面的、大致的认识,涉及了教育立法的涵义和意义、教育法与教育政策的辨析、教育法的内容以及二战后美国、英国、法国、西德、日本和苏联六国教育立法的进展情况;第二篇文章则是思想性的、指导性的,他们强调:“教育法的基本原则,是教育法的立法、执法及研究的出发点和基本依据,是教育法的生命线……我国教育法的基本原则与一切剥削阶级教育法的基本原则有着根本区别,总的来说,与我国总体的法律原则是一致的,它包括社会主义原则、民主原则、统一原则、平等原则、公检法三机关相互配合、相互制约原则。”然而,教育事业自身的规律和特点又有其特殊性,即在不违背国家总体法律原则的前提下,应该有自己的教育立法原则:一是保证教育的社会主义方向;二是遵循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三是培养学生全面发展。三项原则是相互联系的,并非孤立的、对立的。

特别指出的是,李放老师将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视为教育立法的特殊指导原则:在制定和执行教育法时,既要考虑到不同年龄阶段学生的身心发展状况,又要考虑到如何因材施教;既要考虑教育是否符合经济发展的需要,又要考虑是否有足够的经济条件;既要考虑政治、经济对教育的影响,又要考虑教育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既要保证学校以教学为主,又要确保教育工作以教师为主导。直到今天,这些原则对我国教育立法工作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指导价值。

7. 关于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李放老师对改革开放以来高等教育的“热点”问题十分关注,例如高等教育体制改革、高等教育国际化、高等教育地方化等前沿问题。他认为,高等教育是一个多层次、多结构、多功能的社会系统,要管理好高等教育,实现它的社会职能,要深化高等教育的改革,开创高等教育工作的新局面。首先要明确高教的管理目标。要对现代高等教育实行管理,推动高等教育改革的顺利进行,就必须把高等教育的管理目标放在整个教育发展战略的背景下加以考虑和制定。高等教育管理目标应该是指高等教育管理者充分预见到社会经济远景并为保证其实现

而对高等教育所进行的有效的计划、组织和控制,以使高等教育的发展与提高达到一定的预期目标。高教管理目标的作用是:管理目标具有导向作用;管理目标具有激励和推动作用;管理目标具有协调作用;管理目标具有评价标准作用。

在20世纪80年代,国内研究界对于高等教育体制的内涵众说纷纭,但李放老师坚持认为,其内涵应表述为机构设置、隶属关系和管理权限,以及反映它们的各种有关的法规制度所形成的相对稳定的模式。高等教育体制是由许多结构所组成的,就其宏观方面来说,它包括办学结构、计划结构、投资结构、管理和领导结构等;就其微观方面来说,它除了相应的包含宏观方面的一些结构层次之外,还有办学形式结构、组织结构、教育内容结构、专业结构、课程结构、教学生产科研结构等等。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是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所提出的客观需要;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及其反作用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本质要求和必然趋势。

8. 市场经济中高等教育的价值取向。20世纪80年代末期,面对商品经济对整个高等教育的冲击所引发的困惑,李放老师认为,高等教育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具有丰富的内涵。它是由人的价值、社会价值、知识价值构成的多层次、多结构的整体。高等教育价值中人的价值即高等教育培养人的作用,具体表现为培养全面发展的人。这其中既含有社会的要求,又包括人的发展需要,两者是统一的。高等教育价值取向中的社会价值,即高等教育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高等教育的社会价值是多方面、全方位的,如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既要促进社会结构变迁,又要维护社会结构稳定,等等。高等教育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价值取向应该是人的价值、社会价值、知识价值的统一。任何只强调一种价值或一种价值的个别组成部分而忽视其他价值的观点都是片面的、有害的。高等教育价值取向中的知识价值,即高等教育创立新学说、新思想、新思维的作用,有些在当时可能不产生社会效益,但随着科学的发展,其价值将逐渐显露。高等教育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价值取向的三个组成部分,是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整体。

9. 关于教育史的研究。李放老师学识渊博,视野广阔,不仅对现实教育有很深刻的认识,对教育史也有独特的看法。其中,从《红楼梦》看曹雪芹的教育思想是他认识封建教育的一个独特视角。《红楼梦》代表了中国古典文学的最高境界,李放老师认为,这部作品闪耀着早期中国民主思想的光芒,是用文学作品表达民主理想的代表。作品中渗透了反抗整个封建社会的叛逆精神,闪耀着早期民主主义思想的光芒,曹雪芹呕心沥血地通过高超的文学艺术手法,对封建教育做了深刻的鞭笞,对当时的读者有启蒙教育的作用。他认为:“读《红楼梦》所能获得的教益,绝不亚于浏览一部封建教育史。”实际上,李放老师对“红学”研究情有独钟,从教育视角认识《红楼梦》,从一部文学作品中透视历史人物的教育思想,绝非一般人能够做到。

李放老师通过《红楼梦》一书既看到了过去社会的教育状况，也了解到当时一些反对理学的启蒙思想家所做的挣扎，并进一步认识到，作为用艺术形象反映社会生活的上层建筑的文学作品，同以理论的形式加以论说的科学相比，它对我们认识现在和过去的社会现实，具有特殊意义，对于教育研究者来说，这意味着从此有了一种全新的视角来认识教育史。

李放老师的另一篇教育史论文《东北沦陷时期教育研究的方法论及其运用》，体现了一位爱国者的情怀。在他看来，尽管部分日伪学校在东北实行职业教育，强调“知识技能”教育，在一定程度上适应和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为光复后的东北经济建设准备了基础条件，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日本侵略者在东北办教育绝非恩赐于中国人。

10. 关于教育研究的方法论。李放老师一直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他认为厘清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一方面有助于明确理论研究和学习的必要性和意义，另一方面有助于认识到实践主体具有能动性，从而展开实践中的改革与探索。他一直信奉教育理论研究是对实在的一种把握，这种把握是一种理论抽象，但理论本身并不等同于实在。理论所代表的观念与事物之间具有同一性，因而，我们才建设理论、学习理论，借助理论控制事物的变化，通过理论学习提高教师教学理论的修养，树立现代教学观念，影响教学行为，从而提高教学质量。我们也要认识到，理论、观念与事物之间具有非同一性，理论在任何时候都是有限的，任何实践都有超出理论的内容，理论对实践的规范只能在一个有限的程度上有效，教师实践中的探索是教学发展的永恒主题。“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

他还认为：推动教育理论前进的不是抽象的思辨，而是每一个时代的教育实践。教育理论源于教育实践，应用于教育实践。学习和研究教育理论要直面时代、直面实践、直面问题，以改造和促进实践的发展为己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就是要实事求是，就是要立足于国情，要立足于当代，立足于中国教育的现实。实践是理论的源泉，立足于当代中国教育实践，把实践中的问题上升到理论问题，回答实践中的问题，是教育研究的正确方向。教育思想源自于生活，研究方法论源于研究实践，高于研究实践。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是教育研究的根本方法。

在提倡教育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基础上，他更加重视教育理论的中国化历程。他主张教育研究要反思历史，因为从19世纪中叶开始，中国就学习西方教育，尤其是20世纪初现代学制建立后，西方教育思想和理论就一直影响中国，并且有的经过改造已经融入了中国的教育思想中。而我们在20世纪50年代学习苏联教育学的同时，也就开始了教育理论与实践的中国化历程。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改革开放，西方的教育思想不断地介绍到国内，我们的教育工作者也一直开展本土的教学实验和改革，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中国教育实践及教育研究的历史表明，我们一直没有中断

与国外的交流。而正是在中国与外国的教学思想交流中,中国教育研究的问题域扩大了,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学习西方先进的教育思想,同时还要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地转化,使之成为当代中国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他特别强调,中国历史上有丰富的教育思想,无论是儒家教育思想,还是书院中的自由讲学精神,在新的历史时期,都有被发扬光大的价值,需要进一步继承和弘扬。

在20世纪80—90年代,李放老师站在当时国内教育研究界的前沿。无论是教育上层建筑说的争鸣,还是市场经济中高等教育价值的探讨,都体现了他大气的学术风范和高远的学术视野。他的这些理论研究成就奠定了沈阳师范大学教育系在辽宁省乃至全国的地位。

三、李放老师的育人之道

李放老师对教师职业的诠释十分朴素:当老师就应该教书育人。我们不知道他在小学和中学任教期间,培养了多少学生。但我们都知道,当时的辽宁省副省长林声是他在小学任教时教过的学生,在李放老师从教50周年之际,林声副省长写了一首诗送给他:“猫耳山底烽火路,雨风学海自成才。任教五十书甘苦,桃李花红血灌开。”另一位副省长在退下来之后,主动来听李放老师给研究生上课,也同样完成作业和论文,由于没有参加过入学考试,最后无法获得学位,他相当于一位不在册的“受业弟子”。其实,在辽宁省高教界,他最引为自豪的是参与培养了无数不在册的杰出弟子。李放老师从1982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共培养了近30名硕士研究生。其实,凡是在沈阳师大教育系读过书的学生,都把李放老师看成是自己的导师,他相当于教育系所有研究生的“总教头”。

1985年,我有幸成为李放老师的弟子。“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既是古人的育人之道,也是李放老师的育人之道。我对这句古人的治学经验,也是从李放老师那里有了切实的感受。作为李放老师的弟子,在当时的沈阳师大,拥有许多“特权”,我们有机会参加各种国内乃至国际的学术会议。我们前后届的几期学生,在校期间,几乎都有过与他一起参加学术会议的经历,这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到中期是难以想象的。

1986年6月,他带我到兰州参加全国高等教育管理研究会年会,会后到西安的陕西师范大学拜访李钟善副校长,在西安吃了正宗的羊肉泡馍,看了碑林、大雁塔。从西安南下到成都,游览武侯祠、杜甫草堂、望江楼公园。从成都到重庆的西南师大,拜访钟铭琪副校长,参观了渣滓洞、白公馆和朝天门码头。再从长江顺流而下到武汉,拜访武汉大学的刘道玉校长和卫道治教授,游览了黄鹤楼和东湖。这次武汉之行中,刘道玉校长和卫道治老师告诉李放老师,老潘(潘懋元老师)刚刚获得博士生

导师资格，明年要招收高等教育学博士生。正是这个信息，使我萌生了考博士的念头。从武汉再到北京，我们游览了十三陵和刚刚建成的大观园景观。这次周游半个中国，使我开了眼界，结识了当时在国内大名鼎鼎的几位校长。

李放老师曾说我们师生之间有“特殊的师生情谊”，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如果说特殊，那就是他对我的特殊“关爱”，做学生时，在我们同期的学生中，他第一个带我去“游学”，第一个要我与他合作，写论文参加国际会议，这也使我在硕士阶段，就有机会参加国际会议。也许我是他的第一个成为博士生的弟子，故赢得了他的特殊关照。尤其令我难忘的是，无论在我读博士期间还是调到厦门大学工作之后，每逢见面，他都会与我谈起我近期发表的各种文章，指出其中的长处和缺点。这也就是说，在他退休之后，《教育研究》《高等教育研究》以及《新华文摘》等杂志他是每期必看的。其实，他对每个弟子，都是如此关爱，每个弟子说起李放老师，都有各自受到他关爱的经历。正是他的为师和育人之道，使得每一位李老师的弟子，都对他有一份特殊的情感。

李老师的育人之道，首先在于他的识才能力。也许是多年的从教经验，李老师对学生的辨识能力极强，既能从众人中辨认出可造之才，又能看清学生的优势和不足，以扬长避短。李老师的育人之道，还在于其育人之大气。他对学生的指导和帮助，从不计较小处，总是着眼大处，对学生的稚嫩，能够宽严有度，既给予一定的引领，又耐心地宽容学生成长中的不足。所以，作为他的学生，总能在成长中获得自信，在润物无声中得到自身的发展和成熟。李老师虽然只培养了30多名研究生，但这些学生在教育领域乃至其他领域都作出了突出的成绩，其成材的比例相当高。那些年从沈师教育学科走出来的学生都是相当优秀的，不比那些名气更大的师范大学的学生差，有些地方甚至体现出更强的优势。这些人至今都在教育研究领域发挥着骨干作用，以至于每当说起这些，教育圈里的知情人都会慨叹那时沈阳师大教育系的辉煌，都会钦佩李老师的育人之道。

李放老师具有开放的教育大视野，并把他的教育视野转化到弟子身上，这是我作为弟子的切身感受。做学生时，有一次与老师聊天，问他如何才能成为教育学的大家。他说，当你能够把社会上的众多事情，与教育研究联系起来时，你就学成了。尤其是要把那些看似与教育不相关的问题与教育研究结合起来。一席话如醍醐灌顶，使我终身不忘。

然而，他的教育大视野又是深深地根植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他认为，当代中国教育理论的建设应当立足于当代中国的教育实践；中国教育的现代化建设，融于弘扬中国传统教育思想、学习世界先进教育经验和创造当代中国教育理论这三位一体的实践过程中，是一场深刻的持续开展的教育改革运动。

四、李放老师的做人之道

一位真正的老师、教育家，影响学生的方式多种多样，既包括学问和治学态度，也包括研究方法和为人处事。在我看来，李放老师对我的影响绝不仅限于学问和治学态度，更为重要的是他的人格魅力，这是许多老师无法比拟的。

说起李放老师的做人之道，原辽宁教育学院苏甫院长是这样评价的：“他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勇于坚持真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等人民教师所应有的思想政治素质；他具有献身教育、甘为人梯，热爱学生、诲人不倦，严以律己、为人师表，严谨治学、勤奋进取，引导学生超过自己，与同志团结协作、互勉共进等社会主义教师所应有的道德素质；他具有系统的马列主义理论修养，坚实的教育科学理论基础，精深的专业知识，广博的相关学科知识，以及基本的体育、美育知识等教师所应有的科学文化素质；他具有组织教学、分析教材、语言表达、板书绘画、指导课外活动、疏导学生思想、对学生进行常规管理、创造思维和科学研究等教师所应有的能力素质；他具有身体健康、耐受力强，精力充沛、反应敏捷，耳聪目明、声音宏亮等教师所应有的身体素质；他具有轻松愉快的心境，昂扬振奋的精神，平静幽默的情绪，豁达开朗的心胸，坚韧不拔的毅力等教师所应有的心理素质。”苏甫院长归纳的六个方面的素质，是对李放老师的全面写照。

在沈阳师大乃至辽宁省教育界，提起李放老师，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皆与他豪放的性格有关。李放老师在辽宁有许多尊称：李公、李老、放兄、抗大教务长、酒圣。如果你结识了李放老师，并且与他有过深入接触，一定会对他名字中的“放”字有切身的感受，也一定会对“放”字的含义有更深刻的理解。李放老师待人豪放，喝酒豪放，唱歌豪放，思想开放，穿着时尚，教育视野开放，是一个典型的闯关东的侠义山东人和正直东北人形象。现举几个能够体现李放老师做人之道的故事。

我从来没有听李放老师说起过他经历的人生磨难，以及创建沈阳师大教科所的艰难，但我们做弟子的都知道，在最初创办教科所的时候，是他把分散在不同单位、不同岗位上的人一一找回来。由于“文革”刚刚结束，人际关系相对复杂，但李老师不计前嫌，即使在“文革”中与自己对立的同志，他也都一一请回来。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对于在“文革”中曾经批判过自己的人，他也主动做团结工作。正是这样的举动，感染了最初来教科所工作的每一个人，也正是这样的胸怀，使得李放老师在办所之初，赢得了人们的极大尊重。

李放老师喜欢喝酒，辽宁教育界的人都知道，只有与李老师在一起喝过酒后，你才会懂得什么叫喝酒的最高境界，那就是“四中全会，咋喝不醉”。从鸡尾酒开始，然后是白酒，且一定是高度白酒，接着是红酒，最后是啤酒。他喝酒的境界就像他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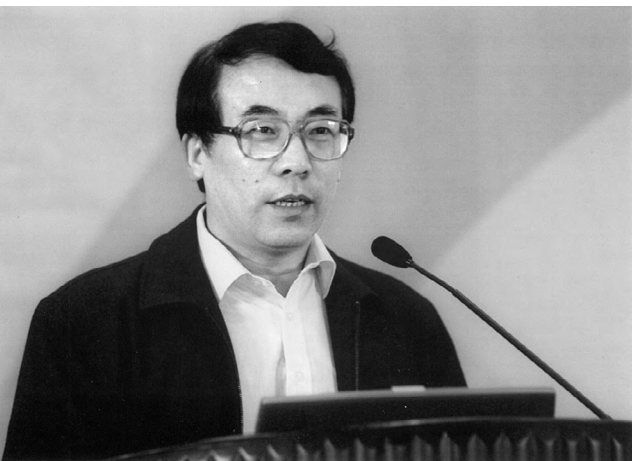
小学到大学的教育实践经历一样，是一个“全能型”的品酒专家。2007年10月，借到沈阳开会之机，我和当年的几位同学晚上去家里看望已经83岁的他，我们重温了一次典型的“四中全会”。不善喝酒的我，在进入到白酒阶段时，就中途离开，而另外两位同学虽然坚持到了最后，还是没有胜过李老师。大约是在1996年前后，华中科大《高等教育研究》编辑部一行来到沈阳师大，那时我还没有调离沈阳。李放老师宴请客人，其中一位客人倚仗年轻，也久闻李老师酒量，几杯酒下肚，就放开了胆量，放言在黑龙江和吉林没有遇到过对手。李老师听闻此言，微微一笑说：“甭说让你出不了山海关，就连沈阳师大这个院子，今天晚上恐怕你都出不去。”结果可想而知，远来的客人败下阵来。十几年过去了，这位客人每逢遇见我，都会谈起当年在沈阳与李老师喝酒的场面。

在我们的学生时代，从未听说李放老师喝醉过，也没听说他因喝酒误事。由此可以说明李老师是一个十分理性和有度的人。微醉中的李老师更令人喜欢，有时他会主动放歌一曲，我们最喜欢听他唱《三国演义》的片头曲《滚滚长江东逝水》和李玲玉的《相见时难别亦难》。在我调离沈阳前的最后一次聚会上，我把《相见时难别亦难》这首歌献给了李放老师，几乎所有在场者都感动得掉下了眼泪。

李放老师为人豪爽大气，快人快语，是典型的北方汉子。但是，无情未必真豪杰，他对家庭、妻子、儿女、学生的深情，都令人深深感动。他看到学生时的那份欣慰、当学生取得成就时的那份自豪、和学生畅饮时的那份愉悦，虽从没有用言语表达，但作为学生，都能深深体会得到，对他的敬慕和热爱之情会从心底里自然而然地产生。

天命之年才开始真正从事教育研究，是李放老师对自己教育研究经历的描述。其实，这也是我国许多老一辈教育家的共同特征。如他所言：“改革开放之后，我已逾知天命之年，青年锐气虽不复存在，但是生活与工作的经历，积淀为我教育研究的来源和基础。”但事实上，他在后来的研究和探索之路上所取得的成就，依然印刻着“青年锐气”。他的挚友刘兆伟教授如此评价李放老师：“其在教书育人的实践中功勋卓著，效果非凡。受其教育，化萎靡乏志为振奋图强者，化莽撞浪荡为深思谨行者，大有其人。而其慧眼透椟识珠，且能除之障蔽，使之华彩大发者，亦不乏其人。将教育理论付诸于教育实践，将教育理念转化为育人之道，李放教授是少有的教育家之一。”

（责任编辑 杨 帅）



邬大光 1957年生，辽宁锦州人。教育学博士，闽江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厦门大学副校长，兼任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全国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协作组组长、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全国高等教育管理研究会副理事长、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评估专家委员会委员。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英国利物浦大学教育学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高等教育研究中心高级访问学者。入选教育部跨世纪

人才培养计划。曾获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二等奖、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教育部第二届优秀青年教师奖，香港大学毕业生同学会基金、陈香梅教师奖励基金、美国富布莱特基金。研究领域为高等教育基本理论、高等教育管理、私立高等教育、比较高等教育等。

《明师以诚 毕生化育——李放教授的学术贡献与育人之道》导读

• 李放老师的教育贡献	(27)
创建沈阳师大教育系、教科所，是该校教育学科奠基人	(28)
辽宁省高等教育研究的“传道人”	(29)
沈阳师大和辽宁教育研究刊物创办人	(29)
参加全国“反修·批凯”写作组	(30)
《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教育”总词条起草人	(30)
组织编写《教育词典》	(31)
• 李放老师教育思想的精髓	(31)
关于“教育是社会上层建筑”的思想	(32)
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	(33)
关于党的教育方针的研究	(33)
关于现代教育观的思考	(33)
有关毛泽东教育思想的认识	(34)
有关教育立法问题的认识	(35)
关于高等教育体制改革	(35)
市场经济中高等教育的价值取向	(36)
关于教育史的研究	(36)
关于教育研究的方法论	(37)
• 李放老师的育人之道	(38)
• 李放老师的做人之道	(40)

Abstracts

My Life Path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Li Fang

(*Shenyang Normal University, Shenyang Liaoning 110034, China*)

Abstract: I have been engaged in education for more than 50 years, mainly in institutions of higher schools. I believe that teaching and research should complement each other. In 1942, I was appointed to a school in Linjiang and I designed a “learning by competing” teaching method, which was the start of my education research and study. There were ups and downs in my exploration, especially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fter Reform and Opening up, my colleagues and I worked hard together and trained a group of excellent teachers for higher education, founded “Liaoning Higher Education Study”, and founded the Education Department in Shenyang Normal University, etc. These experiences made me have much more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education. I even had a concept of the nature of education in my mind, so I wrote the education volume for China Encyclopedia. Education is a part of life and it also comes from our life. We need to combine theory and practice and draw lessons from history and foreign countries so a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and modernization of education in China.

Key words: basic education study; learning by competing; higher education practice and research; discussion of education essence; Anti-revisionism and Critique of Kai; *China Encyclopedia: Education*

Master of Integrity; Lifelong Devotion to Education

——Professor Li Fang’s Academic Contribution and Education Theory

Wu Daguang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05, China*)

Abstract: Professor Li Fang is a well-known educationist of contemporary China, a teacher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and universities for the last 50 years. His educational practice and thought in the 1980s and 1990s was influential in China. His research is extensive, involving basic educational theory, educational management, teacher education, higher education, Chinese educational history. He holds strong educational views, wide visions, distinctive methods, and original ideas in many fields. He was an initiator of the pedagogy of Shenyang Normal University, one of the founders of higher education studies in Liaoning Province, and advocator of the idea “Nature of Education is the Super Structure”.

Key words: Li Fang; educational thought; educational career; prim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higher education